

关注“经济人假说”，构建政治经济学新体系

——全国“经济人假说”专题研讨会综述

□ 张华荣 黄茂兴 黎元生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精神，推进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全国‘经济人假说’专题研讨会”，于2005年5月11—12日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与会者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等十余所国内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

在本次研讨会中，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经济人假说”的内涵拓展，“经济人假说”面临的困惑和挑战，以及“经济人假说”的运用与发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经济人”内涵的扩展及行为制约的边界位移

与会学者从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国国情、经济学的演变及发展等多个角度出发，对“经济人”内涵、性质和行为目标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对“经济人”内涵的拓展

1、对“经济人”内涵的延伸及其争鸣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卫兴华教授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分清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恰当地把经济人假说运用到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关领域，并赋予经济人假说特定的内涵，不要盲目扩大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去，不能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准则，也不要把经济人假说混杂在这些领域，应当分开来加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与亚当·斯密唤起人们的“利己心”，从本质上是不相容的，不会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和谐。因此，要结合我国的现

实情况，正确理解“经济人假说”的内涵，构建符合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春学研究员认为，经济人只是一个关于人的局部特性的、“过度简化的”假设。不能概括为具有“自利本性”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机，而应当将社会偏好、社会认可等新概念引入经济人模型的讨论之中，经济人所追求的不仅是物质利益，而且包括社会地位、名誉等“个人的社会价值”，经济人不仅是利己的，同时也是利他的，是“利己利他”的统一，是“为己利他”的统一。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认为，“经济人”的概念应当与时俱进，基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提高“科学经济人”的新概念，即要做到“经济人”与“利他人”的统一、“经济人”与“非理性人”的统一、“经济人”与“社会人”的统一、“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经济人”与“生态人”的统一。但是，针对“科学经济人”这一新概念，与会学者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浙江工商大学杨文进教授认为，按照“科学经济人”的分析逻辑，则无法实现经济人的“终极目标”，这样必然使这种“经济人”的新界定最终走向狭隘化。

浙江大学陈惠雄教授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对经济人行为的分析基础上的，他把传统的经济人假说内涵区分为五个层次即经济人性质、经济人行为目标、经济人行为状况、经济人运作条件和经济人行为方式，并进而分析了这些被包含在传统经济人概念中的内涵与假设条件所受到的种种责难和批评，提出了应当以“自利

作者简介：张华荣，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茂兴，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助教、博士生；黎元生，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人性”和“经济人性”来有效区分经济人的本质属性。

2、对“经济人假说”性质的修正

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提出,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就不能回避利益问题。他认为马克思重视人的存在,十分注重人的正当利益,应当尊重个人的劳动创造,如果把人的劳动创造而获得的利益等同于自私则是不妥当的。工人劳动、农民种地,获得自己的利益,这种行为是合理且正当的,不应当被认为是自私的,因此,用“经济人”的自私本性,不能解释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合法收入,应当加以纠正。

福建师范大学杨强副教授认为,传统的“经济人”假设与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导向存在严重的冲突,表现在:单一的经济目标与多元的社会价值目标的冲突、追求利益最大化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冲突、利己的经济人与利他道德人的冲突,因此需要从内容和方法论上确立一种“新经济人假设”。

有的代表认为,“经济人”假定对“政府人”假定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缺陷,政府人兼有“经济人”和道德人两种特性,应当合理定位政府“经济人”的社会角色,才能真正体现和谐社会的要求。

(二)对“经济人”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的拓展

由于存在信息不充分,“经济人”的行为也无法实现“完全理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春学研究员认为,必须重新界定经济人行为的特征:(1)由强理性向弱理性转变;(2)由100%的计算理性到遵循习惯和其它无形制度的理性行为;(3)从100%的自我约束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这种行为对个人是理性行为,但对社会是非理性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毛立言研究员认为历史上出现这么多次关于“经济人”的争论而且差异很大,主要是由不同的经济思潮、方法论的差别而存在差异。西方经济学由于受人本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影响,强调严密的逻辑推理,所以西方学者把“经济人”看成是自然化、非社会化、非历史的产物,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从而抹杀了人的社会历史关系,导致研究上以个人主义为主的单体论。而马克思则把人看作是社会关系当中的人,把人看成是社会关系的代表,研究的是特定社会形态人的经济利益、经济运行,强调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福建师范大学汪时珍博士和李建建教授也提出,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取代商品生产、买方市场取代卖方市场、资源环境的约束取代了粗放掠夺利用、规范有序取代了放任无序、经济博弈取代了不平等掠夺,“经济人”单纯的“自利”也必将被“互利”所取代。

东北财经大学邓春玲教授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决定利己和利他两种偏好取向强度,人是一种社会动物,社会环境是制约和形成“经济人”动

机和行为的客观条件,包括社会形态、法律法规、政策规章等正式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宗教、人际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山东经济学院的董长瑞教授也认为,经济学必须研究人,但人不是狭隘的利己主义者,也有利他的一面,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利他的成份必然是越来越多。

浙江财经学院陈惠雄教授提出,“经济人”行为利益最大化目标可以归结为快乐最大化。“趋乐避苦”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则。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这是欲望所决定的。每个人的快乐观均可以包含利己与利他的内容,只不过是人的境界确实存在差异。

福建师范大学张华荣教授则从本体论意义上强调了“经济人假说”自提出以来,对经济学发展的深刻影响,他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应当借鉴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本体论的有益经验,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本体论,实现从“经济人假说”本体论到劳动价值论本体论的转变,以适应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

二、“经济人假说”存在的困惑与挑战

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学研究的趋势是进一步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在这样的一个研究框架下,人们对经济人的批评也日趋激烈,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伦理视角性批评和非现实性批评。

1、实际上,早在19世纪初,西斯蒙第最先从伦理视角向斯密的《国富论》发难。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大部分是精神科学”,必须注重人的道德情感,因此,他总是以深厚的伦理情怀来审视经济人观念,抱怨它诱人追逐“私利”,而“私利”则“促使人去抢夺别人的利益”。东北财经大学邓春玲教授认为,既然是自然存在的,又是社会的存在,同时又具有精神属性。因此,人性中的任何一个属性都不能构成“经济人”的人性根据。因此,像我国这种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里,承认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合法性,就必须承认“经济人”及其对个人利益追求的合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利益问题,既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重视群体中的个人利益,不重视个人利益的实现和满足,只强调集体和社会利益是片面的。因此,“经济人”的“自私自利性”与伦理道德冲突并不能用于解释现实的人,在面对实际的经济现象时缺乏解释力。

2、经济人假说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来自有限理性学说。经济人最大化行为假设,是以完全理性为条件

的,这种理性假定决策者总是用敏锐的眼光,对眼前的一切都深思熟虑。但是,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则认为,事实上,人不可能知道全部的备选方案,外部环境是不确定的、复杂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人的认识能力和计算能力也是有限的,因而,人只是具有有限理性。因此,他认为,有限理性说修正了经济人最大化的约束条件,从决策过程来看,经济人在约束条件下追求的不是最优原则,而是满意原则。此外,从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看,依据“经济人假说”的经济理性思想,南京大学葛扬教授认为,个人的行为具有很大的或然性,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采取实验的方式加以证明。然而,现实的制度安排、经济活动却与古典经济学所崇尚的“经济理论”常常是相悖的。

3、随着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在它们看来,经济人除了自利的一面,还有利他的一面,基于这一分析前提,福建师范大学杨强副教授认为,某些行为用非理性来解释更具说服力,这种对经典经济人的辩证扬弃使经济学研究视野从理性行为扩大到包括非理性行为在内的人类行为,从而弥补了传统经济学的不足。此外,经济人假说也不能解决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全部问题,对一些领域,它无法做出合理和充分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春学研究员认为,经济人模式虽然可以给社会经济领域中广泛存在的“搭便车”、“囚徒困境”问题提供良好的解释,但对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只能在某些“混合型”行为领域提供局部的解释。特别是,斯密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完全竞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但他忽视了外部性和公共品会使“市场看不见的手”失灵,它无法解释现实中的政府管理。

三、“经济人假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发展

1、经典“经济人假说”以每个经济人具有完全的制度知识,并能作出完全理性为假定条件的,其实,这与现实经济不相符,制度是影响人们经济行为的重要外生变量。“经济人假说”的缺陷为新制度经济学形成提供了契机。南京大学葛扬教授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克服路径在于不断的制度设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克服路径在于彻底的制度革命。南京师范大学李曼壑教授认为,斯密的经济人假说,由于受到利己心的驱动,促使企业管理者专心经营,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假说与现实的社会制度既是统一又是矛盾的,假说的适用性必须借助制度重构,没有对制度建设的重视,就无从谈起“经济人假设”。福建师范大学陈玲芳博士认为“经济人假说”与制度的形成及其变迁具有内在的联系。制度变迁的最关键诱因在于经济人对于潜在利

润最大化的追求,而制度变迁能否实现,又取决于不同人群所组成的利益集团的选择。也有代表从泛经济人假说与激励制度的设计、应用分析入手,认为泛经济人不单纯地考虑物质利益,而且包括荣誉、道德等心理效用,因此激励制度的设计应考虑到泛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和效用函数,这样使泛经济人的效用目标更趋同于社会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2、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对经济人假说也赋予了新的内涵,人们力图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和揭示人类的种种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春学研究员认为,当分析严格的市场关系时,经济人假说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一旦远离单纯的互动交换活动时,它的解释力会相对减弱,但仍有其合理的边界。湖南师范大学马伯钧教授提出,引发人们的行为动机是由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经济本性所决定的,但是,自利与私利是有存在一定边界的,自利最大化是人们的一种行为或动机,而不是一种结果。因此,自利最大化这一行为动机与国家、集体的利益最大化是统一的,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是行得通的。特别在经济管理实践中,有的代表认为,我国现在正处在由短缺经济向富足经济的过渡时期,为了生存必然要求重视经济利益,否则,就没有生存的机会,所以“理性经济人”对发展中国家仍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经济人假说的合理内核为最大化行为的选择,即以效率为行为动机的假设,有的学者认为,效率正是体现在资源向最优配置转化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主体是否具有平等地位、自主决策以及自身利益驱动就成为效率高低的重要前提,而这一前提正是和“经济人”假设所应具备的特性相吻合。因此,用经济人假说来分析效率判断,在经济活动实践中,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此外,山东经济学院的董长瑞教授认为,“经济人假说”的这一分析范式为我们把利他的因素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提供有效的蓝本。他认为,实证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都是以假设为分析前提的,但是,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要分析其中的道理,只能从简单的假设前提出发,进而得出结论,然后再反过来逐渐修正假设前提的不足甚至是谬误之处。因此,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说”为前提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正确,但是它的这种研究范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哺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在构建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时,可以把这种利他的因素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责任编辑 陈 燕)